

鲜于浩 田永秀 © 著

近代中法关系史稿

JINDAI ZHONGFA GUANXI SHIGAO

史

稿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法关系史稿

鲜于浩 田永秀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代中法关系史稿 / 鲜于浩, 田永秀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81057-772-7

I. 近... II. ①鲜...②田... III. 中法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近代 IV. D829.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5960 号

近代中法关系史稿

鲜于浩 田永秀 著

责任编辑 闫月勤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87600564)

<http://press.swjtu.edu.cn>

E-mail: cbsxx@swjtu.edu.cn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张: 12.9375

字数: 323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7-772-7 / D · 057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历经七载，这本《近代中法关系史稿》终于得以面世。学海无涯，功力有限；书山曲径，感慨良多。囿于篇幅，仅就下列几点予以简要说明。

其一，呈给读者的这本《近代中法关系史稿》，有别于一般的专门论述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的论著。我们既注意探究近代中法两国在国家关系方面的沧桑巨变，也重点论述近代史上中法两国在文化经济关系方面的发展变化。

近代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以及它自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特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趋势既与它的国际地位息息相关，亦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血肉相连。此外，就中法关系而言，法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与实力，也是影响中法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近代侵袭中国的诸列强中，法国既逊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落后于新兴的美国和日本。它没有俄国同中国陆地接壤的便利条件，也不具备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优势。它的农业较为发达，甚至直到 20 世纪初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还认为，法国与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乏类似之处。它在欧洲敌手也不少，在非洲的摊子铺得与其国力不甚相符，陷入战争的时间亦不短。因此，当虚弱中国有了些许“洋枪”、“洋炮”后，法国还不能以其一国之力取得对中国军事上真正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中法两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关系，与中国同其他欧美国家的、尤其是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相较，在

贸易额、商行数量、商品种类等各方面均远远落后。但是，法国是一个被列宁称之为“剪息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不容忽视的。它又是一个丝织业举世闻名的国家，其对近代中国的生丝贸易以及机器缫丝业的刺激和影响，也是巨大的。

与其他侵华国家相比，法国在思想文化方面还有一些较为突出的特点。它是一个信奉宗教的国家，早在16世纪就以宗教为媒介，在中国的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国民中有了较大的影响，也在中国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四川、重庆、河北、云南等地有了程度不同的传教事业的基础。同样地，因为宗教的桥梁作用，法国亦是较早向中国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的国家。鸦片战争后，法国成为一个最为典型的将炮舰与宗教强加在中华大地上的西方国家。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非常深入、激进、彻底。在法兰西国土上形成的资产阶级文明，亦使全世界在震惊之余又深为叹服。将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法国与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制度上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实际上，中法两国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近代中外关系中却是独领风骚的。

一方面，法国的包括宗教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其他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主要表现在：近代法国在华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宗教文化的影响；法国对近代中国实施的宗教侵略以及由此而来的中西文化冲突，较为集中的体现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之中；近代法国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对法国的影响也是不能忽

视的。虽然这种影响从时间上考察主要在十七、十八世纪，但为法国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素材和思想来源。法国汉学的兴起及其长期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也与鸦片战争前后几个世纪的中法文化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法文化的交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平衡的。鸦片战争前，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输入法国；而鸦片战争后则主要是法国思想文化传入中国。

其二，我们主要依据近代中法国家关系和文化经济关系的实际状况和特点，也为了论述的方便，将近代中法关系初步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1840—1883年为第一个阶段，1884—1900年为第二个阶段，1901—1913年为第三个阶段，1914—1919年为第四个阶段。以上每个阶段在本书中均以一章的篇幅予以论述，加上鸦片战争前的中法关系以一章论述，本书共分五章。

之所以将鸦片战争后的中法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我们是基于下述考虑的。

第一个阶段所涉及的，主要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法国在华开始疯狂地进行侵略性权益的攫取和实施时期。与鸦片战争前相较，这一阶段中法两国的国家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对中国而言，“天朝上国”在处理两国各种关系问题上的主动权基本丧失，中国在中法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决定权亦不复存在。于法国而论，它依仗炮舰政策在中国掠取了一系列侵略性权益，极大地改变了它在两国交往中的被动局面。侵略者的铁蹄与法国式的宗教文化及资产阶级文明相伴，争先恐后涌入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法国人在这一时期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中华民族和清政府进行了露骨的、过分的反攻倒算。法国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比鸦片战争前明显的扩大了。中法文化的冲突融合已经开始，但不太明显，也不很激烈。

第二个阶段所涉及的，主要是从中法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法国在华侵略性权益的进一步扩大和实施时期。由于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中国同法国两国之间进行的战争，我们对这次战争的爆发原因、结局予以适当的论述。对于战后法国在中国掠夺的侵华权益和势力范围，对中国云南等地区的渗透扩张，法国宗教在中国的扩展，法国经济势力尤其是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增加等等，也均予以关注。在这一时期，中法之间的文化冲突，主要以一系列教案，也以义和团运动那样尤为激烈的形式为代表，在中国各地普遍地发生。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近代史上中法文化冲突最为尖锐的时期。此外，也因为中国一些受西学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封建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制度的较为深刻的反思，对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直接观察和思考，甚至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包括法国宗教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法文化的融合也较前一时期广泛深入。

第三个阶段所涉及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中法关系。相对而言，在所谓“中外相安无事”的大环境下，实即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两国的国家关系、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处于平稳又缓慢的发展时期，法国前一时期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性特权也逐步实施。在中法文化尖锐的冲突成为往事之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一些革命党人所关注。这一时期法国人对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所表现出的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是较为引人瞩目的。而这一时期法国与列强之间的明争暗斗，它在清朝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集团之间的“中立”、周旋，令人眼花缭乱。不过，法国对华政策和策略仍然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一切以它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第四个阶段所涉及的，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法

关系。在这一时期，因为国际形势陡变，也影响到中法关系。首先，两国的国家关系发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凌辱者和被凌辱者在外力的操纵下竟成为了盟国，被凌辱者甚至协助凌辱者在欧洲厮杀。由于战争的原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对外贸易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与此同时，法国对中国的贸易也处于停滞不前或倒退的态势。一些法国传教士在战争期间返回祖国，使法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受到较大的影响。

从20世纪初年起，法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曾到法国俭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仰慕，终使法国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派别的重要策源地。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复辟复古思潮，又使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改而追求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他们对法国历史、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大力介绍宣传，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吹捧，在事实上揭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掀起了对中国颇有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在这个运动中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形影相随的，是赴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中国青年之所以乐意赴法勤工俭学，主要是为了追求法国式的“民主”、“科学”，并将此作为新的救国方案。

我们以为，所谓近代中法文化的融合，即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文明输入中国之后，为部分中国国民主要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所吸收，并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有了某种程度的结合，同时也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新、新的社会思潮的发轫乃至思想政治运动的酝酿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以此衡量，以新文化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热潮为标志，近代中法文化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境界。

20年来，学术界有关近代中法关系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

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成果罕有问世。如果说，我们在这本尚不很成熟的书稿中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较为系统的见解，那就主要地体现在上述关于近代中法关系史的阶段划分及其重要内容和特点的说明。当然，这些见解尚待专家学者的评说以及进一步地斟酌完善。

其三，本书所指的法国近代文明，主要为法国近代资产阶级文明，不包括像巴黎公社一类的共产主义文明。

应当承认，国人对巴黎公社的介绍宣传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正是将法国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文明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之后，才转而探索俄国式的救国方案并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从这个意义上考察，与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主义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法国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素材和思想来源有异曲同工之处，法国式的近代资产阶级文明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可资比较的素材。

但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前毕竟不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而当时可称之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并且能够将法国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文明从理论上进行比较研究的，还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少数人。

其四，因为中国和法国各自历史的阶段性划分不一，“近代”一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本书所称的近代，一般是以中国历史为准的，而且时限为 80 年，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但是，我们在论及法国近代资产阶级文明时，则以法国近代史为准，涵盖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后的文明史。

其五，由于种种原因，呈给读者的这本《近代中法关系史稿》还有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课题立项之后，西南交通大学科研处

曾拨专款，期能在法国查阅法文档案资料。但到法国之后，因主要任务是作为学术顾问，参与文献纪录片《伟大的足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实》的拍摄，根本无暇它顾。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资料，也因上海图书馆新建等原因，无法查看。而四川省图书馆新馆至今尚未建成，也使一些资料不能一睹。此外，由于时间关系，对课题组成员风格不一的文风，亦未能作全面的统一。本书疏漏之处，请专家学者不吝指出。

其六，本书既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也是西南交通大学重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同时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在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后，西南交通大学科研处不仅增拨款项，又将该项目列为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并拨给相应的重点项目经费。在本书出版之际，又获学校出版基金资助。在此，谨对大力支持我们进行研究的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联基金处、西南交通大学科研处、211工程办公室，以及校内外学术界的师友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鲜于浩

2003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中法关系	1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法文化交流	1
二、“礼仪之争”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	24
三、鸦片战争前中法文化交流的特点	41
四、鸦片战争前的中法经济贸易关系	58
第二章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法关系（1840—1883）	75
一、两次鸦片战争与法国掠取的侵华特权	75
二、中法两国国家关系的变化	86
三、鸦片战争后法国宗教势力在中国的恢复与发展	99
四、鸦片战争后法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108
五、鸦片战争后中法文化关系的特点	115
六、鸦片战争后的中法经济贸易关系	132
第三章 19世纪末年的中法关系（1884—1900）	146
一、中法战争与法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146
二、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之法国	165
三、法国与八国联军侵华	175
四、教案与中法文化的剧烈冲突	183
五、中法经贸关系的新动向	203

六、19世纪末年的中法经济贸易关系	216
第四章 20世纪初年的中法关系（1901—1913）	222
一、法国与列强在中国的角逐	222
二、中法政治关系的多样性	231
三、法国天主教的变化与教案	259
四、中法经贸关系的显著扩张	267
五、中法文化的初步融合	290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法关系（1914—1919）	315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的处境及远东局势的 变化	315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法关系	322
三、法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与新文化运动	338
四、华工赴法	346
五、法国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352
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法经济关系	367
中法关系大事年表（1248—1919）	381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中法关系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法文化交流

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和其他一些欧洲人曾经记载了关于“契丹”的种种见闻，叙述了亚洲北部和东南亚大陆及海域海岛状况，将中国描述为富甲天下的福地，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东方的极大兴趣。15~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三次探险远航的重要目的都是为了寻求通往“契丹”之路。不过，直至利玛窦（Matteo Ricci）到达北京以后，才确认马可波罗所称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国的别名。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既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最早的殖民国家的对外侵略开辟了道路，也为西方传教士的东行提供了可能。因此，西方传教士把向东方的进军视为整个传教事业的当然趋势，但事实上却是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扩张的必然结果。由是观之，16世纪后西方传教士东来及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唐宋时期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传入中国没有直接联系，潜伏着侵略者的铁蹄与西方文明相伴涌入中国的征兆。加之东西方文化的异趣，冲突在所难免。

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的接触，主要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肇始中国的明清之际。在中国传教之鼻祖，当属方济各·沙勿略（Francios Xaver），他于1549年到达日本传教。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不少中国人。沙勿略认为，要使日本人诚心归化，必须从中国入手。他说：“我期望本年（按：即1552年），可到中国。若福音在中国一经播种，必有丰富之收获。若中国人真心归化，日本人抛弃自中国传去之异说，自不难也。”^①1552年，沙勿略

^①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1990，166。

抵达中国的上川岛（按：上川岛系广东台山市的一个海岛镇，距最近的陆地9.8海里。该岛由主岛和12个小岛组成，总面积157平方公里，是澳门兴建前葡萄牙人对华贸易基地）。但他未能如愿进入中国内地，便死在这个岛上。1562年，耶稣会士开始在澳门定居并建立了一所住院，后来还在澳门成立了神学院。从此以后，澳门就成了传教的基地，“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传教事业，就以澳门为补给站。”^[1]不过，其后一段时间，西方传教士也只能在中国的边沿徘徊。

首先进入中国内地的是罗明坚（Michel Rugoiri）神父，他于1580年至1581年到中国大陆内地。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打开了通往中国内陆乃至北京的通道，在朝廷站稳了脚跟，赢得了明朝皇帝的青睐，和一批王侯、高官及学者交谊甚笃，以至明朝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所谈的天文、历算、地理等学，悉加讨论。”^[2]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了迎合中国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力图在思想、言行乃至服饰等方面中国化。结果，使他们表面上避而不谈的传教事业在实际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特别是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天却与天主教的教义极不相容，因此又埋下了耶稣会在华各个派别的几次大规模论争的导火线。

17世纪末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区。1687年以前，在华的传教士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为主，而极少见到法国人的踪迹。值得一提的是巴吕（François Pallu）。巴吕1658年被教皇任命为爱利奥波里大主教及东京（按：即越南之北圻）教皇之代表，管理中国云南、贵州、湖广、四川、广西五省之精神行政。1658年，巴吕回法国物色神父。1666年2月，他离开法

^[1] 高龙倍. 江南传教史(上编). Colomel, Aug.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5vol., Chang-hai, 1900.

^[2] 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28.

国。1680年，巴吕又被任命为东京教皇代表兼管中国福建、浙江、江苏、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及中国全国一般之精神行政。1684年，巴吕在福建省毛安逝世。对于教廷派遣巴吕东来，法国政府十分高兴，希望利用巴吕以扩大法国的远东贸易。而巴吕本身，也认为宗教、商务、政治应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1672年，他曾致信法国首相柯尔伯(Corlber)，建议在东京建立商行。他在建议书中称，此商行不仅可以增进法国之贸易，而且可以保住教会的发展，还可以于法国王冠下增加新民族。他还称，亚洲诸民族信教之后，则将服从法国的法律，信仰法国同一之宗教，最终与法国成为同一民族，尊法国国王为惟一的国王。^[1]从巴吕的计划中可以看到，部分传教士的确扮演了殖民扩张先锋队的丑恶角色。

1687年后，法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相当活跃。在法国的历史上，17世纪被称为法国“伟大的世纪”，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此时期到达巅峰。特别是1661年路易十四执掌政权后，建立了西欧从来没有的庞大的高效的行政机构和军事机器。国力的强盛及路易十四的勃勃野心，使法国开始向外扩张。在宗教方面，法国也充分利用葡萄牙帝国衰落的机会而结束葡萄牙人的垄断权，发展自己的势力。葡萄牙早在1455年就获得了保教权，所有的传教士，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在乘船前往远东传教前，都必须得到里斯本葡萄牙朝廷的许可，并且要立下绝对忠于葡萄牙王国的誓言。1658年，法国打破了葡萄牙国王对东方天主教传教区的保教权，可以在中国和越南创建不再属于果阿葡萄牙大主教的主教区。

1685年，为绘制法国地图及确立子午线等与地理学和天文学有关的事务，结束以前依靠荷兰舵手的局面，法国政府拟派出科学家到世界各地。此时，恰逢中国教区南怀仁给耶稣会总会写

^[1] 张雁深. 中法关系史考. 长沙: 史哲研究社, 1950.

信要求增派人手，而路易十四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联系，于是法国科学院委托耶稣会选派赴中国的人选。这样，以法王路易十四名义派出的拥有“国王数学家”头衔、颇有学识的首批6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他们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1644—1707）、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 1655—1728）、刘应（Claud de Visdelou, 1656—1737）、白晋（Bouvet）和塔查尔（Guy Tachard, 1648—1712）。他们在法国布雷斯特港启程，搭乘“飞鸟号”（Oiseau）前往中国。除塔查尔留在暹罗传教外，其余5位几经波折，1687年7月23日到达浙江宁波。此时在清宫供职的南怀仁年老多病，康熙帝正准备物色新人选，遂于9月6日传旨：“洪若（翰）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即着送来京候用。其不通者，听其随便居住。”¹¹次年2月，这批传教士抵达北京。

以1687年为标志，开始了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史上占主体地位的时期。据统计，1687年以前，在中国的葡、意籍传教士占该时期总数的71.4%，法籍传教士的地位微乎其微。1687年后，法国传教士占该时期的传教士总数的64.2%，法国传教士的地位凸显。

由于第一批法国传教士学识渊博，深得清政府赏识，张诚、白晋还被留在宫中为康熙皇帝讲授几何、哲学、人体解剖学等科学知识。于是康熙帝让白晋回国招揽更多的俊秀之士。白晋奉命于1689年返回法国，并随身携带了康熙皇帝赠送给路易十四的49册汉籍。白晋回国之后，将他在中国的见闻广为宣传，并给法王路易十四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中国皇帝历史画像》（Portrait de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这份报告公开出版后，在法国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仅把欧洲“中国热”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也为白晋的招募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¹¹ 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66。

白晋在法国招致了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来华，并力促“昂菲特利特”号（L'A mphitrite）首航中国。1698年3月6日，该船由法国西海岸的拉罗舍尔港起程。途中，在好望角附近偶遇前往东印度的一个船队，该船上亦有数名法国神父。“醉心于率大批传教士赴华的白晋神父认为应从这批神父中挑选几名随他同行。果然，他挑中了孟正气（Domenge）和卜嘉（Baborier）两位神父。这样，昂菲特利特号船上有了11名耶稣会传教士。”^[1]7个月后，白晋等人抵达上川岛。随船而来的，还有路易十四的使节及海军军官和商人。此即为中法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昂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以此事件为标志，中法两国进一步开始了外交往来。清朝康熙皇帝和法王路易十四曾互赠书籍，揭开了中法两国之间官方文化交流的序幕。

由于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白晋等人是法王路易十四所派出的，其目的之一是与中国建立联系。这几位具有科学知识的法国传教士到中国后，不仅使西方宗教在华传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发生了若干引人瞩目的变化，也引起了中外、中法关系史的重大变化。而且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是在1687年，并且确与中国中央政权取得了联系，康熙帝已经下旨召其进京。其后，中法两国的官方联系亦有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因此，从中法两国官方接触开始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一年视之为鸦片战争前中法关系起始的一年。

重返中国的白晋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在一封信中写到，一名缉盗船上的中国军官5年前曾与他在广州谋面，“自告奋勇带我们前往沙勿略的墓地”。随后，这位军官又带白晋面见上级，由后者派员护送赴广州，“还让我享受钦差荣誉称号”。白晋在广州“用了三天时间接待和拜会省里主要官员，他们都恭贺我迅速顺利地回到了中国”。昂菲特利特号被特许“可沿珠江

^[1]【法】杜赫德，郑德弟，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29.